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東 方 學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 東 方 學

在布拉根斯基 (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領導下的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科學工作小組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書號：1533

東方學

者：在布拉根斯基(И.С.Брагинский) 領導下的蘇聯科學院  
東方學研究所工作小組

者：丁 則 良

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行者：新 華 書 店

刊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000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20,000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元

4045

東方學是歷史上形成的、研究東方的歷史、經濟、語言、文學、藝術，以及物質和  
精神文化的古文物的各種學科的總體。在東方學中，所謂東方，一般是指亞洲和非洲（主  
要是北非）各國，這些國家很久以來就已成爲歐洲列強和美國的殖民地擴張對象，曾經  
長時期是，或者至今還是他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蘇維埃東方學研究「……過着不同  
的生活，在不同的條件之下發展着」的「兩個東方」（斯大林：「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  
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五頁）——一  
個是「再沒有資產階級政權，已經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工人階級正在掌握着政權」的東  
方各國；另一個是「資本主義還在統治着，帝國主義的壓迫還完全保存着，還需要爭取  
獨立、驅逐帝國主義」的東方各國（同上書，第二八四——二八五頁）。對於古代和中  
世紀早期東方各國的研究（當時東方各族還未處在殖民地、附屬國的地位，而享有國家  
的獨立自主），也包括在東方學各種學科的體系之中。

資產階級東方學和蘇維埃東方學對東方學的研究對象，對東方各族的過去和現在，採取正相反的態度。資產階級東方學，反映出歐美資產階級殖民者種族主義的世界觀，它從最初出現的時候起，就把所謂「西方」文化（即歐洲文化和後來的美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對立起來，誣蔑東方各族爲劣等種族，說東方各族自來是落後的，不能獨立決定自己的命運，彷彿只是歷史的對象，而不是歷史的主體。資產階級東方學把研究東方一事完全屈從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政策。

蘇維埃東方學，遵循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和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學說，站在原則上相反的立場上來對東方進行研究。斯大林寫道：「從前，『照例總是』認爲：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下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而只有淪爲被剝削者的命運，後者是唯一的文明代表者而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出，那些獲得解放而捲入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民族，其能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六頁）蘇維埃東方學主要注意東方

各民族解放鬥爭的科學研究，和擺脫了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壓迫的東方各國的經驗的總結，首先是蘇維埃東方各共和國的歷史經驗的總結。

資產階級東方學產生於歐洲列強最初在東方各國擴張的時期，即所謂資本原始積累的時期。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出現了西歐商人、傳教士和其他最初到東方來進行貿易和掠奪的探險隊隊員所編成的關於東方各國的記載，如門多薩 (Mendoza) 在一五八五年所作的關於中國的記載，歐利里阿斯 (Adam Olearius) 在一六四七年所作的關於波斯和高加索的記載等等。十六世紀的巴黎大學，十七世紀的牛津大學，都曾講授一些近東語言 (特別是阿剌伯語)。十七世紀末，在歐洲的一些大學中 (萊登、巴黎、牛津)，蒐集了大量的東方手稿；其結果，是出版了第一批根據東方資料編成的有系統的著作：戴爾倍羅 (B. d'Herbelot) 等人編的「東方文庫」等等。在少數著作中，例如在法國旅行家柏尼埃 (F. Bernier) 的著作中，企圖描寫東方社會制度的一些特點。不過，在資產階級東方學家的最早的著作中，就已經表現出對東方各族的侮蔑態度和力求從思想上給在東方各國進行殖民地擴張「找根據」的特徵。

十八世紀，東方語言學獲得了顯著的發展。一七七一年，法國學者兼旅行家盎克提

爾·杜·伯隆 (A. H. Anquetil du Perron) 把「阿維斯塔」經 (Avesta) 譯爲法文，他也寫出了關於印度某些地區的記載。英國學者瓊斯 (W. Jones, 一七四六——一七九四年)、科爾布魯克 (H. Colebrooke, 一七六五——一八三七年) 開始以梵文雅語與歐洲語比較來研究梵文雅語。創辦了一些研究東方語言的高等專門學校：維也納的東方語言學院 (一七五四年創辦)，巴黎的現代東方語言學校 (一七九五年創辦)。大多數的資產階級東方學家，特別是英國的東方學家，成了殖民政策的公開辯護人。

十九世紀初，在解讀古代東方銘文方面，會有很多的發現：對於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的解讀，有一八〇二年格羅特芬德 (G. F. Grotefend) 及其後的柏爾努夫 (E. Bur-nout) 所作的發現；對於亞述、巴比倫楔形文字的解讀，有羅靈遜 (H. Rawlinson) 所作的發現；對於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讀，有商波利翁 (J. F. Champollion) 於一八二二年所作的發現。由於與歐洲以及後來美國殖民政策的利益密切結合，東方學研究的範圍擴大了，到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小亞細亞、印度、中國進行了許多次考古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探險，這些探險通常帶有間諜的性質。各種「亞洲學會」的網增大了：加爾各答的「孟加拉亞洲學會」(一七八四年)；巴黎的「亞洲學會」(一八二二年) 從一八二三

年起出版了「亞洲學報」，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一八二三年)也出版了自己的雜誌；萊比錫的「德意志東方學會」(一八四五年)從一八四七年起出版「年報」，等等。

十九世紀後半，出現了歐洲最大藏書庫收藏的東方手稿和書籍的詳盡的目錄，專攻東方語言的高等學校的網大大地擴展了。東方語言的辭典、語法和教材的出版，和原稿的印行等項工作，獲得了鉅大的發展。這些原稿是以專門的叢刊，主要是語言學性質的叢刊和各種「叢書」等等的形式印行的。根據東方學蒐集的大量實際材料，發表了古代東方通史的教本，對印度、中國及其他東方國家的研究和整理出來的史料；如關於古代東方通史的教本有一八六二年羅靈遜的，一八六三年敦克爾(M. W. Duncker)的，一八六八年勒諾爾曼(F. Lenormant)的，一八七四年馬伯樂(G. C. Maspero)的，一八八四年邁爾(E. Meyer)的，關於印度的研究和史料有坎寧翰(J. Cunningham)·穆勒(J. Mill)·艾略特(G. Elliot)·道遜(J. Dawson)等人的，關於中國的研究和史料有沙畹(P. Chavannes)·哥迪埃(A. Cordier)的。從一八七三年起，定期地每隔三、四年就召開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十九世紀後半是資產階級東方學蒐集和整理大量實際材料的最發達的時期。同時，即使在最好的東方學著作中，也暴露了作者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的局限性和腐朽性。除開支配着一切資產階級科學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階級傾向和不客觀以外，在東方學中（更甚於人文科學其他部門）佔優勢的還有：與公開辯護殖民地掠奪完全合拍的對遙遠過去的鑽研，研究之帶有狹隘的形式語言學性質，醉心於宗教神祕方面，輕視對各個社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研究，輕視對人民運動的研究，以及完全忽視早已失去了國家存在的東方各小民族和遊牧部族的文化的作用。

資產階級東方學的腐朽性，在於其反科學的方法論，在於資產階級東方學和殖民地擴張的利益之間的有機聯系。資本主義列強的間諜，殖民機關的官吏，經常以東方學家的身分出現，如腓爾比（J. Philby）、克爾松（D. Curzon）、賽克斯（P. Sykes）等人都是。資產階級東方學不能闡明東方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中的歷史規律。在資產階級東方學中，廣泛流行着邁爾論歷史發展的「循環性」，否認前進的歷史運動的反科學觀點。資產階級東方學者們製造了東方一向停滯不前的虛構的反動理論，和「一向普遍存在的封建主義」在東方佔統治地位的反動理論。他們捏造了關於東方各族無能力獨立發展的神話。

在帝國主義時期，西歐和美國的資產階級東方學顯示出深刻的危機。雖然整理積集

東方學資料的工作繼續在進行，如以四種文字出版了「伊斯蘭百科全書」，編寫了各種綜合性的教程和東方學參考書，可是，資料的蒐集比以前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利用來討好帝國主義政府，使它們據以偽造歷史。資產階級東方學加緊製造各種種族主義的「理論」，來掩蓋帝國主義掠奪壓迫東方殖民地各族的政策並替它辯護。資產階級東方學家把東方學變為帝國主義的公開奴僕，宣傳虛構的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文明使命」，抱着間諜的目的來搜集東方各國的各種情報和統計材料。東方學中最反動的是美國的偽東方學科學。在美國，對東方的研究總是處在極低的水平，它帶有最露骨的殖民者的色彩。美國生意人企圖掩蓋美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反動的劊子手身分，宣傳世界主義和種族主義，蓄意通過東方學來絞殺東方各族的鬥爭意志。他們用各種方法來幫助美帝國主義實現其冒險的侵略計劃，幫助它和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作鬥爭。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印度、波斯，以及俄國境外的其他東方國家中，出現了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如薩爾卡爾(Дж. Салкар)、卡茲維尼(М. Казвини)等。他們的著作的特點，通常是材料充實，比起西歐和美國同道的作品來，較少為帝國主義辯護的態度。不過這些學者習慣於惡劣的資產階級方法論，

並對帝國主義科學「祭司」的「權威」奴顏婢膝。他們之中的某些人甚至對帝國主義東方學的「極端性」作出了某種程度的批評，但他們却表現出民族改良主義的思想，在他們自己的著作中，原則上也沒有越出資產階級東方學的範圍之外。祇有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在蘇維埃科學的影響之下，在蘇聯境外的東方學中纔發生了根本劃分界限的過程。一些傑出的學者們，特別是斯拉夫各國和東方各國的傑出的學者們，擺脫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東方學的立場，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格羅茲尼(Б. Грозный)、伊朗的涅菲西(С. Нейиси)等。

許多世紀以來俄羅斯和東方各族間所形成的歷史關係，以及像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所強調的，俄羅斯「對東方所起的進步作用」(參閱「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二一一頁)，促進了俄羅斯東方學的發展。從十二世紀起，俄羅斯的旅行家，就提供了許多關於東方各族地理、經濟、宗教和生活習慣的有價值的報導，如聖地參謁者達尼爾(Даниил Папомир)、諾佛哥羅得人斯傑凡(Стефан Новгородец)、伊格那提·斯摩爾尼亞寧(Игнатий Смо-льнянин)等人所作。從十五世紀起，自從阿法內喜阿·尼基丁(Афанасие Никитин)撰

寫印度記及赴印途中見聞以後，俄羅斯就特別加強蒐集關於東方各國和各族的各種報導。這種蒐集工作在十六——十七世紀中繼續進行。在十七世紀，出現了關於一六一八年彼得林(Петлин)旅行中國的報告，和俄羅斯使節拜可夫(Ф. И. Байков)和斯巴法里葉(Н. Г. Старфие)的中國旅行記，使俄羅斯和世界的東方學大爲充實。十八世紀，羅索興(И. К. Россохин)死於一七六一年)和列昂節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一七一六——一七八六年)寫成了關於中國的有價值的著作。至十八世紀末，出現了列頗興(И. И. Пелёхин)關於西伯利亞，吉爾頓什德特(А. И. Гильденштедт)一七四五——一七八一年)關於高加索和伊朗語的專論研究。俄羅斯勘查家在葉尼塞河上游發現突厥語系各族文字的遠古碑銘，也是屬於這個時期。十八世紀四十年代，關於在科學院中設立東方語言講座的問題，被提出來了。這一意見在一七五四年得到了羅蒙諾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的支持。列別捷夫(Г. С. Лебедев)的研究工作，從十八世紀末延續到十九世紀初，他在印度住了十二年(一七八五——一七九七年)，研究當地語言，並編成了一部歐洲最早的梵文語法(一八〇一年)。俄羅斯東方學家俾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僧名雅金夫(Иакинф) 一七七七——一八五三年)是促進十九世紀俄羅斯東方學發達的最傑出

的東方學家之一。他精通漢語，蒐集了大量有關中國史地的著作，加以研究，並譯爲俄文。他編纂中國誌，漢語語法，編成了有關中央亞細亞和西伯利亞各族歷史的漢文資料（也由他譯出）的鉅大的全集，這一全集直到今天還保持其學術價值。俾丘林和普希金以及十九世紀前半其他俄羅斯進步人士都很接近，贊同他們的自由思想。俾丘林的著作遠勝於同時代西歐人士的著作。

十九世紀俄羅斯東方學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在於俄羅斯東方學家在思想界限的劃分上，具有非同時代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東方學所能比擬的深度。俄羅斯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對俄羅斯東方學家的影響，在這種思想界限的劃分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別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車爾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和杜布洛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對東方表現出不倦的關懷，他們對殖民地被奴役的各族，始終抱着深刻的同情心，對歷史事件作出深刻的分析，並激烈反對把東方的遠古的社會制度和當時的社會制度理想化起來。別林斯基把整理俄羅斯東方學著作的工作也包括在自己的卓越的俄羅斯文學評論中，並專爲它們寫了幾篇評論。他堅決反對以所謂「中國和印度完全孤立發展」爲理由而把它們算成「歷史範圍以外的國家」。別林斯基斷言說：「中國和印度

是有高度歷史發展的國家」，「中國是偉大的現象……，印度……無愧於其在歷史上的光榮地位……」（別林斯基全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二三四——二三六頁。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東方學問題非常注意，他研究東方語言，跟俄羅斯著名的阿刺伯學家薩布魯科夫（Т.С. Садыков）保持聯系。車爾尼雪夫斯基經常注意「東方問題」\*，在他所編輯的「軍事選集」（一八五八年）中，給東方學以重要的地位。他關心阿刺伯學方面的問題和國內研究梵文的情況。他揭露了資產階級科學的種族主義立場。杜布洛留波夫熱烈地對待在東方發生的政治事件。他是正確地指出沙密爾（Талмеры）政策的反人民反動性質的第一個人。杜布洛留波夫在其專論印度人民起義（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的著名論文中，把這次起義看作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統治的必然結果。杜布洛留波夫曾對華西里也夫（В.И. Вильямс）院士所著論佛教一書寫過專門的評論。偉大的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寫成了有關東方學問題的若干著作，其在學術上的某些評價雖然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但這些著作在方法論方面仍是馬克思以前時期所有文獻中最優秀的著作。

俄羅斯東方學的許多傑出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俄羅斯傑出的梵文學家彼得羅夫 (П. С. Петров, 一八一四——一八七五年) 與別林斯基有親密的友誼關係。俄羅斯最大的阿富汗學家之一，喀山大學教授阿里斯托夫 (Н. А. Аристов) 寫成了在革命前的文獻中最優秀的、關於阿富汗社會和巴丹人 (Pathans) 反對英國掠奪政策的鬥爭的記載。有一批政治放逐犯如保戈拉茲·丹 (В. Г. Богораз-Тан)、什頓貝爾格 (Л. С. Штернберг)、彼卡爾斯基 (Э. К. Пикарский) 等人，他們在東方學這一方面的活動特別有意義。他們在被沙皇放逐的時期，研究遠東各族的語言。偉大的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對帝俄壓迫下東方各族的傑出學者們的科學活動，如對阿捷爾拜疆人米爾紮·發塔爾·阿洪多夫 (Мирза Фаталь Ахундов, 一八一二——一八七八年)、布里雅特人多爾日·班紮羅夫 (Дорж Банзаров, 一八二二——一八五五年)、卡查赫人卓干·瓦里哈諾夫 (Чокан Валиханов, 一八三七——一八六五年) 等人的科學活動，曾給予直接的影響。

革命前的俄羅斯東方學雖與西歐資產階級東方學在同樣的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而且同樣主要是使用形式的語言學的方法，但上述這種影響却使得它帶有一些與眾不同的

優點：從理論上概括的工作做得很廣泛，十分關心社會經濟問題，對東方被壓迫各族時常採取同情的態度，並對殖民制度最惡劣的表現進行批判。在俄羅斯東方學中，反動的君主制殖民者的傾向，比西歐和美國的東方學表現得弱得多。代表這種傾向的許多人，集結在皇家「庇護」下的「東方學會」中。進步的俄羅斯東方學家們，在其研究工作中，超過了外國資產階級東方學的代表們。他們大胆地並首次地解決了許多科學問題，寫成了有價值的著作，並在東方學中開闢了一些新的部門——突厥學、高加索學等。絕大部分突厥語、蒙古語、伊朗語、高加索語、古代亞洲語、滿語和其他語言，都是俄羅斯學者研究出來的。

俄羅斯的漢學學派，如卡法洛夫（П. И. Кафаров，一八一七——一八七八年）、華西里也夫（一八一八——一九〇〇年）、紮哈洛夫（И. И. Захаров）、喬治也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一八五一——一八九三年）、伊凡諾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一八六三——一九〇三年）等人，從俾丘林的時候起，就為全世界所公認。漢學和佛教方面的鉅著的作者華西里也夫院士，寫出了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概要，並研究出編纂漢語辭典的合理的體系。俄羅斯的滿洲學，以最傑出的滿洲學者俄爾洛夫（А. М. Орлов，一



八一六——一八八九年)、紮哈洛夫、伊凡諾夫斯基等人為代表。它的先進地位是被公認的。

俄國科學在研究印度方面的功績是很大的。一八五二——一八五七年，編成了詳盡的梵文雅語辭典，一八七九——一八八九年，編成了簡明的梵文雅語辭典；這些辭典，以「彼得堡辭典」的稱號，躋於世界文獻之林。密那也夫(М. П. Минаев, 一八四〇——一八九〇年)是梵文雅語、梵文俗語、巴利語和近代印度語的大家，他出版了大量古代印度文學的典籍，編成了當時最好的巴利語法，創立了俄羅斯的印度學學派，這學派還有鄂爾敦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一八六二——一九三四年)、什徹爾巴特斯基(Ф. И. Шербацкий, 一八六六——一九四二年)、庫德略夫斯基(Д. Курьявский)等人。

在革命前俄羅斯東方學中的突厥學方面，從事研究的有貝烈津(М. И. Березин, 一八一八——一八九六年)、卡塞姆伯克(А. К. Казембек, 一八〇二——一八七〇年)、拉得洛夫(В. В. Радлов, 一八三七——一九一八年)、梅里鄂蘭斯基(П. М. Меринганский, 一八六八——一九〇六年)、卡塔諾夫(И. Ф. Катанов, 一八六二——一九二二年)，彼卡爾斯基等人。他們編成了各種突厥語的語法和辭典，紀錄了許多方言，寫成了